

文史篇



毛泽东人格中的墨家气质及其中国气派

陈斯金

在痛责正统儒学“男盗女娼”时，却对历代造反者大加赞赏；在抨击道貌岸然的圣贤大儒时，却对小人物的伟大创造击节称赏；在挖苦大知识分子时，却对各种“老粗”表示敬意，提出“高贵者最愚蠢，卑残者最聪明”的奇特论断，在对付强大敌人的威胁与挑战时，他轻蔑地作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毛泽东鲜明的价值判断和独特的人格特征。毛泽东人格的形成源于多方面因素，既有西学东渐的外来文化影响，更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因子。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从人格精神上讲，毛泽东那种任侠仗义的豪杰品性、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勤俭苦拙的生活作风伴随他一生的革命道路，而这些都与墨家文化有关。毛泽东的人格深受墨家文化中极具开拓的精神和最富个性的气质影响，并由此形成独具时代特色的中国气派。

墨家，先秦时与儒学同称为“显学”。双方都因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但两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却截然相反：儒家明确主张要全力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而墨家则主张“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以大禹的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和实践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并创立墨家学派。代表下层劳动者利益的





墨家学派与儒家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上从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秦汉以降,由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墨学渐成衰微之势,并几近湮没,但墨家的思想和精神并未就此灭绝。墨学的思想精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人格理想模式顽强地存在于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并构成民间反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关于毛泽东对墨家思想予以高度肯定的最直接依据便是《毛泽东书信选集》中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和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两封书信,以及《毛泽东早期文稿》中辑录的《伦理学原理》批注。我们从“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观、“国际主义”的外交观、“人定胜天”的自然观、“勤俭建国”的创业观、“任人唯贤”的用人观、“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观以及“消灭战争”的军事观等方面,大体可以窥见墨家的“兼爱”“贵义”“非命”“节用”“尚贤”“尚同”“非攻”等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毛泽东。

一、墨家“兼爱”思想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亲民观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目的是以“兼爱”为基础,建立最为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来实现“天下之大利”。这种“大利”就是盛行于无等级无差别的上古社会的大同之治环境下的原始共产主义平等原则,大家互帮互衬、协同合作、平等公正、视如己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家兼爱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家族本位,代之以社会本位;打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贫富、贵贱的地位,代之以新的彼此平等的地位,这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爱,它立足于小生产者的道德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人民性。

从人格精神上看,毛泽东相当完美地实现了墨子的以“兼爱”为基础,以实现“天下之大利”的人格风范。如果说被青年毛泽东视





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还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那么当他自觉地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之后，就始终以墨子式的胸怀去爱利天下百姓，始终站在底层大众的立场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

毛泽东理解的“兼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平等意识和观念。平等意识和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鲜明标志之一，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具有很丰富的内涵。毛泽东最重民族的平等。首先，毛泽东提出民族平等的政策。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很多党员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其次，毛泽东还倡导官民的平等。这里的“官”指的是共产党员和领导者，“民”即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毛泽东反对将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进行区别对待，他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随便欺压呵斥的“民众的上司”或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毛泽东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1944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阶级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可以说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是主旋律，那个时代出现了铁人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至今还闪耀





着人民性的光辉。

二、墨家“贵义”思想与毛泽东“国际主义”的外交观

墨子提出,万事莫贵于义,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从事于义。墨子对于“义”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认为它是“天下之良宝”,是达成其所希冀的“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骄贫,壮不夺老”的美好愿景的基本前提与必要条件。毛泽东吸取了墨子的“贵义”在国际上表现为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新理念推向全世界。尤其是毛泽东针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念,一改“弱国无外交”的思想,为发展中国家规划出了新的外交发展之路。

墨家的“贵义”和“兼爱”是融为一体的,所以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评价“兼爱”说:“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从这一思想出发,毛泽东把它注入到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之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就体现了这种“损己利人”的精神。在其《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认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





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1950年9月毛泽东接见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罗贵波时说：“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

三、墨家“非命”思想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自然观

墨家“非命”思想认为：“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毛泽东认为：“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固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这是毛泽东后来人定胜天思想的起始，继而以“人定胜天”来鼓励人民群众，希望达到墨子一度主张的“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的局面。毛泽东说：“四川的老百姓一怕老天爷，二怕瞎指挥。老天爷我毛泽东管不了，马克思也管不着，但是我提倡‘人定胜天’，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井冈山时只有几个人，可是后来建立了新中国。”他进而一再强调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但是，毛泽东过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四、墨家“节用”思想与毛泽东“勤俭建国”的创业观

《墨子·节用》篇以衣服、宫室、甲兵、舟车的制作为例，大谈圣人的节用之法，认为“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兴利多矣”，旨在增加国家财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毛泽东汲取了墨家的这一思想精华，





他不仅自己一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把这种思想提升到勤俭建国的高度。他在1948年4月1日的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1956年11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提到：“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正是依靠“勤俭建国”这一方针，才使我们在建国初期医治了几十年战争的创伤，甩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

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墨子的“尚力”观念，即强调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力”和“强”乃生存之本，“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五四”时期盛行的“尊劳主义”“劳动神圣论”，是效仿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积极宣传劳动生产的重要性，把劳动归结为人类最本真的状态。毛泽东也把崇尚劳动视为锻炼青少年和后备力量的重要途径，甚至将其视为防止干部思想变质的重要保证。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就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他还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五、墨家“尚贤”思想与毛泽东“任人唯贤”的用人观

墨子强调“尚贤”的思想，选贤任能，不分等级贵贱，“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可见，墨子之所以提倡“尚





贤”，最重要的就是反对以血缘为主的任人唯亲的宗法制度。结合这一主张，毛泽东形成了他的人才观。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老粗出人才。”他多次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还说，人才不在天上，人才在人民群众之中，在中国人民中间到处有诸葛亮，工人中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用人路线问题：“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则是不正派的路线。”在“尚贤”的思想意识中，毛泽东曾给予底层民众以崇高的礼赞。在他看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和圣人君子所创造的，而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把相信、尊重和依靠、放手发动群众作为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法宝。

六、墨家“尚同”思想与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观

墨家“尚同”思想是从“尚贤”思想引申而来，是为了贯彻其政治措施与选拔任用人才的主张而提出来的，“尚同”，即“上同”，其目的是“壹天下之制”，只有天下一同了，人们才能相亲相爱，社会才能安定，这样在“兼爱”的基础上，尚贤、尚同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墨子的尚同思想是高度的集权主义，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有效管理，它要求一切统一于上级，从组织系统的领导关系到思想意识，都要绝对地统一于上级，服从于上级，绝对不许反其道而行之，墨子认为的上下级关系反映了要贯彻最高层意志的组织系统





与组织原则。

毛泽东有关“高度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原则”与墨家的尚同思想有一定联系,他认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毛泽东还将干部标准从“才德兼备”发展到“又红又专”。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也就是说业务须尚同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思想上来。

值得警惕的是,墨子的尚同思想在大至国家小至一家当中有一定的凝聚力,但如果运用不当,会使权利过分集中于某一个人,难免会产生权利滥用的弊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还会干涉到百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自由,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甚至还会出现在官场上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指鹿为马的恶劣现象。

七、墨家“非攻”思想与毛泽东“消灭战争”的军事观

墨家“非攻”思想从“兼”的原则出发,反对的只是侵略战争,而并不一味地反对战备和正义战争。墨子非常强调经常防备敌国的侵犯,把忽视这一点列为导致亡国的“七患”之一,提出了加强战备的主张。

关于备战之本,毛泽东部分地吸收了墨家“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的思想。他多次讲,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国防建设,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一再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加紧国防体系的布局和建设,要与帝国主





义争时间抢速度。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指示,批语说,毛泽东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随后,毛泽东说:“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批语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毛泽东还部分地吸收发展了墨家“兵者国之爪也”的思想,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他还明确指出,国无防不立,强兵是必要的。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必须及时加强我国的国防,特别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氢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墨子第一次将战争分为“诛”与“攻”,即诛战与攻战。认为诛战是讨灭害民君主的正义战争,攻战则是大国、强国以掠夺土地、财富、人口为目的非正义战争。“今逖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





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此，“非攻”绝不是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在分清战争性质的基础上，对“诛”赞同之，对“攻”反对之。

毛泽东承继了这种观点，早在1938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就说过：“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就是本着这一原则，用正义战争赢得了长久和平，赢得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尊严。

（本稿由宿迁市社科联推荐）



陈斯金，江苏宿迁人，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西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宿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宿迁市社科系列文学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发表文艺学、地域文化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参与编写多部著作，有多篇论文在省、市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的学术成果评比中获奖。

